

姜詩文

吉林人民出版社

97
K256.107
3
2

姜铎文存

— 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论丛



吉林人民出版社

C

560326

(吉)新登字01号

2001.12

姜铎文存

——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论丛

李艳萍 责任校对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春市东新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28.125印张 650 000字

1996年7月第1版 199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 000册

ISBN 7-206-02539-0

G·654 定价:45.00元

卷头絮语

前年（1994年）八十自寿时，曾与余生立下三大志愿：一是把原来分散在三本论文集里有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论文，加上第三本论文集1992年8月出版以后新发表的十余篇文章，集中出版一本总的论文集；二是把自己的一生经历，写一本自传体小说；三是找机会到世界各国周游一下，主要想看看世界第一强国——美国的风光，因为说来惭愧，我还是一个没有出过国门的“土八路”啊！

时间过得真快，这一说又过了整整两年，今天已是1996年的新年头上了。令我十分高兴的是，上述三大志愿，居然都有了眉目：自传体小说，去夏在长春蒋雷小儿家避暑三个月时，已写出青少年时代到入党的第一部十余万言的初稿，今年打算继续写下去；周游列国事，去年五月有机会赴香港中文大学出席中国海关史第三次学术讨论会，鸟瞰了一下半异国式的港岛风光，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进修博士的侄女姜进，这次回国，又许下明年邀请我赴美参加她的博士毕业典礼；出论文集事，更是出乎意料地很快变成了现实。

去年年底，长春小儿蒋雷，来长途告知，吉林人民出版社，已同意出版我的论文集，要我把稿子赶快整理好寄去。这当然是好消息。我花了整整半个月的时间，才把全部文稿整理校阅完毕。全文书分成下列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洋务运动，文章24篇；第二部分资本主义，文章26篇；第三部分历史人物评论，文章8篇；第四部分书评，文章9篇，共计67篇文章，约60万言。书名定为《姜铎文存》，副标题加“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论丛”。这

是我这个“半路出家”的人，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40年来，除了几本专著以外的主要论文。有的学术界同仁认为：学术论文比学术专著，更能集中反映学术观点，我这次通读了自己的论文以后，完全有同感！我这本总的论文集，就算我这下半辈子献给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界的一砖一瓦吧！也算我这个人遗留在人间的一鳞半爪吧！

这本论文集的洋务运动部分，有七篇文章，是和上海社科院已故院长黄逸峰同志共同合作署名发表的，每篇文章的题目旁边专门做了三角记号。黄老是我从事学术研究的良师益友，他已逝世8年，今年是他的90诞辰，请允许我借这本集子的出版，来向他表示诚挚的缅怀和纪念！

代序作者徐鼎新副研究员，是我在上海经济研究所的老同事，以研究旧中国商会史而成名，他为我写的学术传略，是比较实事求是和恰如其分的，因而在征得他同意后选作代序。

在当前出版界，出版学术著作，仍然是赔本生意，出版论文集则赔得更多。出版论文集的困难，我在1992年自费出版《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过程中，是尝够了个中苦味的。因此，这本论文集的得以顺利出版，应该感谢吉林人民出版社领导诸公的大力支持，特别应感谢为这本书奔走和费神的吴铁光先生！

最后，借此机会对同生死共患难的洪涛老伴，从70年代即离休在家操持家务，照顾我的日常生活，令我可以专心一致地继续从事学术研究，毫无后顾之忧。因而这本论文集的出版，她作为我的后勤部长，是功不可没的！

姜铎 1996年元旦于上海

姜铎传略

代序

徐鼎新

姜铎，又名蒋立^①，江苏丹阳人，1915年生。少时曾就读于当地私塾七八年，打下了国学根柢，也为他日后治史准备了较扎实的文字基础。1930年他随父命进商店当了几年学徒，但他并不安于习业从商的社会生活，基于对时事的关切以及对新文化知识的向往和追求，他经常抽暇认真阅读各种书报，非常刻苦地进行自学，努力领会他所希望激悟的一些国家政治和人生道理，其中，他对梁启超的《饮冰室全集》特别感兴趣，许多警世名篇，常使他爱不释卷，反复诵读，内心蕴积的爱国意识，日益炽烈和升腾。

当时正值举世震惊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接踵爆发，日本侵略军大举入侵中国，国家民族的危亡迫在眉睫。在国内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热潮中，青年时代的姜铎也激发了抗日救亡热情，他毅然脱离商店，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先在家乡兴办一家农场，奉行“农业救国”的改良主义路线；继而于1935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读书，就读期间，曾引导同学响应“一二·九”运动；接着又汇合一批志同道合的救亡青年在家乡组织青年农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为了探索革命真理，他怀着求知的渴望，认真阅读《新哲学大纲》、《新经济学大纲》等进步书籍，从中获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知识。

抗日战争期间，他正式走上革命道路，曾任新四军五师旅政

^① 姜铎乃是本名，而“蒋立”则是参加革命后的化名，沿用至今，但他发表文章或出版著作时，大多用“姜铎”署名，因而“姜铎”本名反成了笔名。

治部副主任、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等职。解放战争期间，担任中共苏南丹阳、常州、镇江三城的地下工作特派员。1949年参加接管上海，曾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劳动局第三处处长兼劳动介绍所所长等职。

1957年他进入上海经济研究所，转入社会科学研究工作岗位，他的研究重点是近代中国经济史。1981年评为研究员。1985年离休后，仍作为该所特聘研究员继续活跃于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科学研究领域。

从一位职业革命者转变为一位国内外著名的经济史研究专家，经历的道路是崎岖曲折的。为此，他付出了比一般科班出身的人更为辛勤的劳动，而变幻的政治风云又使他经受了种种磨难和打击，但他对科研事业的执着追求和勇于开拓、探索的理论勇气，又使他无论处于顺境或逆境都能坚韧不拔，一往无前，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内提供了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果。

他的理论勇气和探索精神，还在他进入理论界以前就已显露出来。当姜铎在上海市劳动局等机关任职期间，他就孜孜不倦地潜心钻研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理论，利用业余时间，较系统地通读了《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等经典著作，并结合学习心得在报刊上陆续发表过一些文章。同时，又分别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班、大同大学、中华职业学校、商业干部学校等处讲授过劳动问题、唯物辩证法等课程。自1957年初调至正在筹建中的上海经济研究所以后，他积极参预该所关于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和改造科研规划的制订，担任资料室主任，并兼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大隆机器厂、恒丰纱厂三个调查小组，开始进入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

1958年10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姜铎主持编辑的《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这是他到上海经济研究所以后集中半年时间主持完成的第一部科研著作，也是他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

领域内已经具有独立进行科研能力和达到的科研水平的初步显示。由于当时国内还缺乏全国性的反映我国物价问题的专门著作，而居全国经济贸易中心地位的上海的物价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因而此书出版后，很快便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瞩目。中国人民大学的机关刊物《教学与研究》，曾特地记载了该书第一章：“解放前近30年来的物价概况”的全文；日本一家研究刊物，也对该书内容和学术价值作了详细的评介。迄今为止，这部著作一直成为研究近代中国物价问题的主要参考书。

1958、1959两年，他在《学术月刊》、《文汇报》等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一系列有关商品经济、价值规律、物价等问题的文章。其中，以深入浅出的通俗文字介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政治经济学谈片》，陆续在《文汇报》理论版上发表后，深受当时读者的欢迎，为扩大社会影响，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专门出版了小册子。在理论研究中，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敢于坚持事实，坚持真理，不随声附和，也不屈服于任何压力。1959年5月在上海召开全国经济理论讨论会期间，他协助时任上海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的黄逸峰，率领一个庞大的调查组，专程赴南通川港人民公社进行深入调查，向会议提交一份《南通川港人民公社调查报告》，实事求是地论述该公社解放前栽种薄荷致富的历史和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一些问题。这本来是理论工作者应该持有的正确态度，可是在以后“左”倾思潮日益泛滥的情况下，这份调查报告就因为写了当时人民公社化过程中的一些实情，说了一些真话，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受不公正的批判。1959年间，上海经济研究所曾组织力量专题研究上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在充分占有有关资料进行分析、综合研究的基础上，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排印了《上海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书的征求意见稿本（未正式发行），这部书稿也是经姜铎之手完成的。该书稿结束语曾在《解放日报》上先期发表，可是却被当时主管

上海市委宣传工作的张春桥横蛮地扣上所谓“和平主义”的帽子，组织对该文轮番大张挞伐。这部书稿虽然被迫调整编写人员重新改写，但仍被打入冷宫，一直拖延到1980年10月才得以正式出版。

在近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领域内，洋务运动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两大问题是姜铎的重点研究项目。对于前者，他本来素无研究。1960年确定由他组织力量主持编写一家百年老厂——江南造船厂的厂史，在分工负责撰写厂史第一章关于江南造船厂最早的前身江南制造局产生发展的过程中，开始接触到洋务运动这一近代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但是，最初研究洋务运动，史学界主要根据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和牟安世的《洋务运动》两部书中的观点，一般对洋务运动均持全盘否定态度。自从八卷本《洋务运动》史料出版以后，为史学界深入研究洋务运动提供了系统的信史资料，这对正在主编江南造船厂厂史的姜铎，提供了较好的研究条件。当时他把这浩瀚的八卷史料书从头到尾极其用心地翻阅了一遍，对所有史料进行审视、鉴别、研究和分析，开始对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传统观点有所怀疑。

跳出前人研究的窠臼，提出自己新的学术创见，这正是姜铎的研究风格。在60年代前期，他结合《江南造船厂厂史》的编写工作，以旺盛的研究精力和一个革命军人原型善于连续作战的作风，在开始涉猎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领域内发表一系列经过他比较深入研究后撰写的有关洋务运动的论文，提出了一些新的论点，对全盘否定论进行质疑和问难。发表于《学术月刊》1961年第10期上的《论清朝官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一文，可以称之为他对洋务运动研究的“处女作”，文中在引证分析有关资料的基础上，明确肯定洋务运动中办起来的一批近代军事工业已经具有资本主义的性质。接着，在国内外有较大的社会影响的《文汇报》上连续发表他撰写的题为《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

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论文^①，这本来是一篇系统论述洋务运动的长文，作者试图从上述三个方面论证洋务运动对中国近代化进程存在着促进作用的一面，不应完全抹煞。经过《文汇报》分成三个单篇论文连续发表以后，对史学界震动颇大。这也可看作是姜铎对历来因袭的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传统观点的一次公开挑战，从而在当时史学界引发了一场热烈的争论。在来自各方的支持或商榷的学术争鸣面前，他认真研究各种不同意见，并继续撰写有关论文，力图把洋务运动的讨论引向深入。1962年第8期《学术月刊》上发表了他的《略论洋务派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一文，对洋务运动作了综合的研究。与此同时，他又同黄逸峰合作撰写了题为《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的长篇论文，发表于《历史研究》1963年第1期。此文对中国洋务运动之所以破产，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成功，通过对比，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以洋务运动为命题的学术讨论，本来是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一场很有意义的学术活动。一开始讨论还比较正常，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可是到后来，由于“左”倾思潮的干扰，气氛越来越不正常。一些不同意姜铎观点的文章，胡乱给他上纲上线，迫使他只能保持沉默以示抵制，从而窒息了正常的学术争鸣。在10年动乱期间，姜铎人身也失去自由，他对洋务运动研究的一系列成果，更被当作“罪状”而进行蛮横的讨伐。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胸中所怀的一颗强烈追求真理的心，依然不停地跳动。他坚信总有一天会云开日现，重新返回到自己所热爱的近代中国经济史研究工作岗位上，继续从事他被迫中断了的科研事业。

“四人帮”被粉碎后，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

^① 分别发表于《文汇报》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和1月21日。

提倡解放思想号召下，重新评价洋务运动，很自然地提上学术界的议事日程。已经回到研究工作岗位的姜铎与出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的黄逸峰，应《历史研究》编辑部的约请，撰写了《重评洋务运动》一文在该刊发表，文中坚持洋务运动存在着反动与进步双重作用、两者不可偏废的论点，引发了关于洋务运动问题的一场新的学术界争鸣热潮。

迄今为止，全国性的洋务运动问题大讨论，已经先后召开了六届会议，每届会议，姜铎都积极参加，并提交经过他深入研究后撰写的论文。第一届长春会议，他与黄逸峰联名合写题为《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一文，对湘潭大学徐泰来的商榷文章进行答辩^①；第二届上海会议，他提交了同黄逸峰联名撰写的《洋务运动总论》一文^②；第三届兰州会议，他单独撰写《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一文，与丁日初、沈祖棻所持晚清国家资本主义的论点进行商榷^③；第四届汕头会议，他写成《曾国藩其人》一文^④；第五届东营会议，他提交《略论李鸿章》一文^⑤。第六届宜昌会议，他提交《洋务运动对津、广、汉、沪四城的早期近代化影响之比较研究》一文^⑥。

除此而外，1984年间，他和黄逸峰应党中央机关理论刊物《红旗》杂志之约，写成《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一文，在该刊发表^⑦。

1981年，他发表的《参加长春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后几点管见》一文，日本研究中国洋务运动的林要三教授颇感兴趣，译成日文，发表于日本立命馆大学法学会主办的《立命馆法学》1983

① 载《历史研究》1980年第6期。

② 载《学术月刊》1983年第4期。

③ 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6期。

④ 载上海《社会科学》1989年第2期。

⑤ 收录于《李鸿章与中国近代化》论文集，安徽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

⑥ 载《近代史研究》1993年第4期。

⑦ 载《红旗》1984年第7期。

年第1期。

坚持按“两点论”评价洋务运动，是姜铎的一贯主张。他认为，把洋务运动纳入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就会发现洋务运动同时存在着进步与反动、积极与消极的双重作用；而后一方面作用则是主要的。他既反对全盘否定洋务运动的观点，也不同意把洋务运动说成是完全进步的运动。在历次争辩激烈的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上，他是持上述观点进行论战的主将。然而，所有参加论战的专家学者都对他良好的争鸣态度表示赞赏。他为自己确定了学术争鸣三原则：（一）欢迎不同看法，欢迎批评；（二）不上纲上线，尽量避免意气之争；（三）保持私交友情。在许多学术争鸣场合，他正是这样做的。10年来他同丁日初不断就学术问题进行争辩，但两人友情却久而弥笃。

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是近十余年来拓展的学术研究新领域。在这以前，由于“左”倾思潮的影响和干扰，研究中国资产阶级问题，就会涉嫌为资产阶级“树碑立传”而横遭批判，因此对这一在近代中国历史发展中担任重要角色和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社会阶级的研究，长时期内无人敢于问津，形成一个人为的学术“禁区”。10年前，国内史学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正确方针、路线的指引下冲破了这一“禁区”，展开了关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大讨论。姜铎也积极投入了这一命题的争鸣活动。他对中国资产阶级的看法，始终坚持存在着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在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特定社会条件下，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是一种不正常的畸形状态，存在着外国资本、本国官僚买办资本和民族资本三种不同的类型。根据经济基础产生阶级的原理，在近代中国的土地上，除了存在代表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外国资产阶级而外，必然在官僚买办资本主义经济和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基础上相应地产生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两个不同的本国资产阶级。

总的来说，这两个不同类型的中国资产阶级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本质不相同的。但是这两个阶级又原本是一对孪生兄弟，关系密切，难分难解，而且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近年来，随着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研究和讨论日益深入，有关档案、史料不断得到发掘、整理，他对于近代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认识在进一步深化的过程中有若干明显的改变。

其一、在坚持存在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的前提下，对这个阶级中的某些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表现，从发展、变化的角度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分析和重新进行认识和评价。例如他过去参与编写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中，不但对买办阶级划属范围嫌于过宽，而且对凡被定性为买办阶级成员的具体人物也一概骂倒。近几年来，他的看法有较多改变，具体体现于由他主持编写的新的科研成果《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一书中。他为该书撰写的前言内明确指出：“已出版的《旧中国的买办阶级》一书，因成稿于‘文革’前夜‘左’倾思潮抬头的时候，并囿于某些传统观点，故对旧中国买办阶级力量的估计存在扩大化和简单化倾向，付印前虽一再作了修订，但原有痕迹仍不少残存。在本书编写中，我们根据实事求是的原则和近年来新的研究成果，对某些观点作了必要的修正和补充”^①。敢于坚持原则和勇于修正错误，具体体现出一位经济史学家的优良学风，颇为史学界同仁所称道。

其二、对于民族资本和民族资产阶级在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进步作用加深了认识，并先后撰写了一系列有关论文。他认为，当世界革命已进入无产阶级革命的新时代，而在封建落后经济仍占主要地位的旧中国，资本主义的进步性，却远远没有成为过去，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一）具有鲜明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性格；（二）具有鲜明的反封建性格；（三）比之官僚买办资本要进步得

^① 见《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江苏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前言”第1页。

多，而且同官僚买办资本存在着基本矛盾。他认为民族资本在旧中国三种资本因素中是唯一能代表近代中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这一正确方向的进步因素，是中国资本主义的正宗，是促进近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生产方式^①。而民族资产阶级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主要的是起着进步和积极作用^②。他认为用毛泽东悼念著名工业资本家范旭东逝世的“功在中华”四个字来评价整个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是当之无愧的^③。

经过30余年的风风雨雨，进入耄耋之年的姜铎已是一位功成名就的国内外著名经济史学家了。然而他依然是那样平易近人，依然是那样精神饱满，在经济史研究这块园地上不倦地耕耘，每年总要在他已经累累的科研成果堆上增添一批散发时代芳香的新的果实。他的近作《略论旧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三代核心人物》一文，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季刊》1992年第3期发表后，引起社会各界的重视。《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分别全文转载；《澳门日报》、《天津日报》、人民出版社的《学习》杂志，又分别作了摘论；有些素不相识的读者，还专函表示赞赏。1993年6月，他的以《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为书名的第三本中国近代经济史论文集印行了，该书共选载1985年离休以来的26篇文章，约25万言，广泛分送国内外学术界朋友，颇得同行好评。姜铎性格豪爽，待人真诚，胸襟开阔，办事果断，既有皓首穷史、锲而不舍的学者气质，又有高屋建瓴、挥洒自如的大将风度。他非常关心中青年研究工作者的成长，乐于为中青年指点传授知识和治学经验。在所内，不少中青年研究人员成了与他相知莫逆的忘年交；在所外，也有一大批年齿不同的同行友好与他长期保持联系。不论来自何方，凡是在经济史研究方面有求于他者，他都满怀热情地

① 《从无锡薛家谈到旧中国民族资本》，《上海经济研究》1986年第4期。

② 《略论旧中国松太华资本集团》，《江汉论坛》1987年第1期。

③ 《旧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结束语”，第646页。

对待。例如北京大学一研究生在撰写关于中国资产阶级问题的毕业论文时，几次写信向他请教，并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他多次复信，就提出的问题逐一进行解答，并阐述自己的看法，同时，又寄去有关历史资料。1984年间，中共中央党校一青年教师在《学术月刊》上发表了关于周学熙资本集团性质的变化问题同姜铎商榷的文章，对此，他在进行答辩的同时，又热情对该青年教师进行鼓励和帮助。一位曾两次同他一起开会，聚议洋务运动的青年教师，觉得深受教益，并钦佩他“不断追求科学真理的精神”，认为他作为一位“著名学者，却以平易谦逊的态度出现于群众之中，更受人敬仰”。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们期待着姜铎先生有更多的新作问世，并祝他健康长寿。

（徐鼎新，男，1931年生，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

——原文载上海中山学社主办《近代中国》第4辑——

姜铎文存

——近代中国洋务运动与资本主义论丛

姜铎传略 —— 代序

徐鼎新

目 录

第一部分 洋务运动

①论清朝官办近代军事工业的性质	1
②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	17
③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	25
④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	35
⑤略论洋务派经济活动的若干特点	42
⑥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在经济发展上的比较	53
⑦重评洋务运动	86
⑧论洋务运动引进西方近代技术的经验教训	107
⑨要恰当地评价洋务运动的积极作用 ——答徐泰来同志	142
⑩参加长春洋务运动学术讨论会后几点意见	158
⑪关于洋务运动评价问题	165
⑫洋务运动总论	170
⑬如何正确评价洋务运动	187
⑭谈谈洋务运动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195

⑮研究洋务运动的几点心得	203
⑯开滦矿权被断送经过的剖析	
——中国近代经济史上触目惊心的一页	209
⑰论洋务派与维新派之异同	225
⑱中日甲午战争与洋务运动	235
⑲略论洋务企业的性质	249
⑳福州船政局与江南制造局在旧中国生产发展之比较	262
㉑洋务运动与改革开放	285
㉒洋务运动对津、广、汉、沪四城早期近代化影响之比较研究	294
㉓洋务运动与晚清政局的演变	324
㉔晚清海关与洋务运动	335

第二部分 资本主义

①如何看待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形态	351
②解放前上海造船工业中的包工制度	357
③上海沦陷前期的“孤岛繁荣”	368
④调查散记	
——旧中国民族资本史料集锦	381
⑤旧中国有没有官僚买办资本	
——《江南造船厂厂史》回答的一个理论问题	403
⑥略论旧中国三大财团	407
⑦略论旧中国三种资本主义	434
⑧略论旧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点	455
⑨略论旧中国两个资产阶级	461
⑩略论旧中国裕大华资本集团	479
⑪从无锡薛家谈到旧中国民族资本	495
⑫鸦片战争与中国近代化	